

观念·方法·体系：西方文学人学思想研究的中国范式

Concept, Method, and System: A Chinese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in Western Literature

肖丽华 (Xiao Lihua)

内容摘要：在我国西方文学研究领域，蒋承勇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他以人的母题为线索阐释西方文学传统，提出具有学术史意义的总体构想：以两希文化为深层结构，围绕原欲/理性的互补关系，并在连续与变奏的历史视野中贯通西方文学的发展阶段，系统追踪“人”的观念演变。在研究方法上，他建构出“文学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并与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相互印证，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人性观念为纲”的文学史书写路径，将西方文学史呈现为西方社会人文精神的发展史。其研究彰显出中国学者在西方文学人学思想研究中的原创视角与学术范式。

关键词：蒋承勇；西方文学；人学思想；两希传统；文学人类学

作者简介：肖丽华，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人文主义文学思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欧洲文学与科学关系研究”【项目批号：23&ZD30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Concept, Method, and System: A Chinese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in Western Literature

Abstract: Taking “the human” as a guiding motif, Jiang Chengyong interprets the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 and advances an overarching framework of historiographical significance: he posits Greco-Hebraic culture as a deep structure, foregrounds the complementarity of desire and reason, and, through a lens of continuity and variation,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ideas of the human across major stages of Western literature. Methodologically, he develop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in dialogue with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related fields. On this basis, he proposes a mode of literary-historical writing organized around conceptions of human nature, presenting Western literary history a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spirit in Western society. His work exemplifies the original perspectives and scholarly paradigms Chinese scholars bring to human-centered approaches in Western literary studies.

Keywords: Jiang Chengyong; Western literature;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Greco-Hebraic cultures; literary anthropology

Author: Xiao Lihua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er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s ar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and Renaissance humanist literature (Email: xiaolihua@zufe.edu.cn).

钱谷融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观点，被视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命题，尤其是这一命题的重新确立，被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艺理论的最重要突破之一”（朱立元 4）。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蒋承勇对这一命题作出系统回应并加以理论深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即围绕“文学与人学”展开深度思考，连续发表30余篇高质量论文并相继出版《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现代阐释》等著作，为后续的体系化建构奠定基础。历经多年积累，他最终近50万字的总括性著作《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及近40万字的文集《人性探微——蒋承勇教授讲西方文学人文传统》，对西方文学人的母题进行全景式梳理，参与了“文学是人学”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纵观其文学与人学关系的研究，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既是文学主题研究的范本，也是方法论的引领；既是以母题研究为核心对文学史的重写，又是以文学为媒介完成的一部西方思想史。

一、西方文学两希传统与“人”之生成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西方文学呈现出思潮流派更迭相继的发展模式，对人性的探索与追问贯穿其中，蒋承勇承继钱谷融等提出的命题，认为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西方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持续回荡着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深刻而深沉的生命意识与人性意蕴因此成为恒久的组织原则”（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 1》），因此沿着历史的纵向轴线去追踪不同时代关于“人”的观念变化，就更容易接近西方文学的人文内核。在文学的母题学研究中，神话作为深层叙事语法，承载着宇宙观和哲学思考，具有文学解释的某种元语言特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型库¹，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蒋承勇着重选取了几组神话作为论述的起点：失乐园故事、耶稣故事，以及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故事，追溯了人的母题的诗性来源。因此，其研究路径与原型-神话批评的思路具有相通性，但他的关注焦点始终是对“人”的理解，是为了将这一问题从文本、故事引回到文化源头。

蒋承勇把两希文化看作解析人的母题的深层构架，强调两希传统各自内部的复杂性，二者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异质互补。希腊传统大体呈现“神-原欲-人”的三重面向，但尊重原欲并不等于排斥理性。希伯来-基督教传

1 参见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页。

统构成的是“神-理性-人”的结构，更强调对原欲的压制，但内部也保留情感与生命颂歌。然而，从相对与比较的意义而言，希腊文化主要体现出一种重原欲的世俗人本意识，希伯来文化则呈现更多的内倾向特点，体现出理性型的宗教人本意识。二者共同构成了对立互补的人性依据，并由此形成一组常用的二元分析概念：原欲/理性、禁欲/纵欲、个体/群体、生物性/社会性、入世/出世等。从本质上看都来自对人性本身的理解，“出自人类自我实现与自我解放的需要”，最后指向“一种对立又互补共生的关系”(47)。这一论述可以看作研究西方文学的“纲”。

在明确了这一基本观念后，蒋承勇对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提出“连续与变奏”的考察机制，并对许多争议性关键问题给出极具启迪意义的解释，例如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关系。他指出，从论述“人”的内涵这一角度来看，中世纪文化具有清晰的古典渊源，同时又孕育了文艺复兴所需要的因素（如科学精神、事实原则、人文教育、博爱平等），所以二者之间既相续又有变化，绝非对立与断裂。若要考察人文精神的连续与变奏，就应将“人”的概念放在具体文化语境中，例如他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研究，并未将之看成单一整体，而是从时间与地域两个维度加以区分把握。前期以意大利、法国为中心，更突出“原欲+人智”；后期以北欧、英伦为中心，趋向“原欲+人智+上帝”。¹正因近代早期多重文化力量的交汇与碰撞，“人”的内涵日益成熟，并深刻影响此后各个时期。例如启蒙主义文学张扬了古希腊-罗马的人本传统和近代科学理性，从道德意识的角度使宗教理念世俗化，从而形成了基本稳定的两希人文传统的现代构架：既张扬自我，重视个体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又寻求道德律令对自我的约束，寻求理性与原欲、灵与肉，个体生命的自然吁求与社会道德律令之间和谐统一的自由境界，“人道主义是两希文化传统融合之产物”（蒋承勇，《人性探微》1）。浪漫主义则扩张主体性，确认自我、自然、超验的关系，故而也孕育着非理性色彩；现实主义面对社会结构与人性困境，既被物化又反抗物化，人性主题必然带有巨大的冲突与张力。可见，从连续与变奏的角度来看，“人的母题”在西方文学中经历了世俗化、内在化与主体化的演变。

中国学界关于文学是人学的理论讨论，强调文学创作与批评都要“以人为出发点”，“把人写活”，“以表现历史与现实中的物”作为评价标准（陈晓明 29）。因此，在文学批评中不仅要总体思想进行把握，更需要对具体的文本个案进行细致分析。蒋承勇所提出的两希文化的分析框架在文本个案研究中极为有效，例如他把俄狄浦斯放在“人之为人”的复杂结构中来加以理解：就文明史与个体经验而言，人首先是生而不自由的——既受自然与社会的限制，也被命运的网络缠绕。俄狄浦斯为躲避预言而出走，却因更自由

1 参见 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2页。

的行动而更准确地落入预言,这并不是对德性或理性的否定,而是揭示了理性—道德表层之下仍有原始性/野性的残留。于是,求知不仅是找出客观真相,也是对自我的艰难认识。他把神话母题、人性分析与文明反思贯通起来,使文本个案研究具备了广阔视野。

蒋承勇的文学母题研究是以两希文化为深层语法,把神话原型、文本细读与文学史视野相结合,建构出人的母题的文学发展脉络。既强调人的母题的传统与源头,也要细致区分各时期的变化,体现出对延续与变奏的历史性眼光。因此,他把西方文学的人性内涵,从源头到现代,展现为一个历时性结构,并在不同历史情境与审美坐标中,分析人的困境、自由与自我实现如何不断被提出、改写,并获得新的意义。

二、“人学”脉络与文学史重写

马克思主张“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本性”(669),因此文学与人学的研究,只有上升至文学史的维度才能把握在历史时代中的发展与变化。蒋承勇关于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正是如此,他从西方古典文学一直论述至20世纪现当代,具有恢宏的格局,可以说这正是一种重写文学史的思路与实践,尤其是其2018年再版的专著《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可以将之理解为一部特殊形式的文学史。

目前中国大陆境内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大体有两类路径:其一为作家—作品研究,侧重文本内容与风格、作家生平与个性;其二为文学思潮研究,关注重要作家的诗学理念及其背后的哲学、美学基础。蒋承勇本身就是国内使用率最高的多部外国文学史教材(如《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纲》《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现代阐释》《欧美自然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的主编或副主编,具有丰富的编写经验。而他在《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中另辟蹊径,提出并实践了外国文学史书写的第三种类型——以人性观念为纲的重构式文学史。通过建构“人的母题”的阐释框架,书写了一部西方文学发展的新体系。这一体系与西方学界长期沿用的有关人的本质的二元对立模式不同,他认为人的自我应是一种原欲—理性的结构模型,在两极之间动态摆荡并不断调适的功能整体。从对人性自我本质的洞察出发,他梳理西方文学的发生与演变,藉以理解千差万别的文学现象背后的西方精神主导,纲举目张,勾勒出线索清晰的文学发展脉络。

在全书结构上,也呈现出某种文学史般的架构。“导言”相当于总纲,既提出将文学与文化打通的方法与视角,又奠定以人性为西方文学内核的理论基础。第一章“人与文化之起源的诗性解说”和第二章“原欲与理性的对立与互补”构成理论部分:通过对文化悖谬的解释,将文化理解为人的对象化与外化,并以原欲—理性为参照,建立西方文学自我观的互补结构。第三章至第九章则一方面承接前两章,从早期文明进入中世纪、文艺复兴,再转

入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另一方面把前述理论框架落实到典型文本与历史阶段的细读中，起到实证与检验的作用。同时，后七章的具体论述深化了理论部分，使对西方文学基本形态与精神实质的历时性认识更为深入。可见，他以人性观念为支点，重组既有文学史书写的知识图谱与叙述逻辑，为外国文学史提供了一条兼具解释力与系统性的新道路。

这一重写文学史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可以有效去除传统文学史书写思路对某些问题的遮蔽。例如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文学的研究中，蒋承勇采取的是一种两章对读的研究思路，从而以人性的连续与变奏改写了常见的断裂与革命叙事模式。他首先从“古典渊源”、“科学精神的温床”、“爱的人文意蕴”等多条线索展开，论证了中世纪对文艺复兴的人文指引，最后以“延续性、包容性及多元共存”作为两段文学史关系的总结，从而把中世纪放入文艺复兴的“准备史”或“前史”中，而非仅仅作为文艺复兴的“负面背景”。在讨论文艺复兴文学的人文内涵时，强调与中世纪的关系是“延续的与非同一的历史”（114），文艺复兴对中世纪既有人文传承又有变异。他区分前期人文主义文学与后期人文主义文学，强调了后期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意识的密切关系，从而打破了人文主义在文学通史中过于泛化的统一性描述。这种双章对读的结构安排，构成了对文学史分期与分割传统写作模式的重写。他将这种研究思路贯穿于每一章的分析，例如在浪漫主义人学内涵的分析中，他并非简单重复文学史的一般概述，仅是强调浪漫主义抒情性，而是将之界定为“人的再发现”——通过“颓废中呈现另一个自我”（270）与“自然中再现另一个自我”（281），展示了自我分化与基督教宗教情结如何孕育着现代主体性的内核。从而，他把浪漫主义从“张扬情感”的风格标签，转化为对自我结构的编码，并与人学研究的基石——两希文化的思想前后呼应。

由此可见，蒋承勇对西方文学人学思想的研究是以“人”为纲的文学史重构，“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西方社会中人的精神发展史，也是西方文学人文传统的演变史”（1）。他围绕人的主题，实现了对文学史历史分期的再组织，并以章节对读的方式，强调连续与变奏，慎用突变与断裂。从“史”的角度把握西方人学的内涵，也加深了他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20世纪现代文学“上帝的失落”，并非单纯的宗教衰落史，也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追求的片面的人的生命价值的世俗化的结果，而“宗教人本的传统衰落，恐怕也是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之一”（蒋承勇，《“人”的母题与西方现代价值观》23-29）。这正是从文学史的维度完整地把握西方人文精神的嬗变的更重要的学术意义。

三、文学阐释与思想史、观念史的互动

蒋承勇以两希文化为核心源头，从观念史层面提炼人的核心概念，作为他对西方文学人学研究的解释框架。关于西方文明起源虽有多种表述，但将

希腊-罗马与希伯来-基督教视为最主要的源头，仍是学界的通行认识。前者在文学中主要呈现张扬个性、肯定原欲与现世生活；后者则塑造以理性与群体本位为核心、强调超现实生命价值的宗教人本意识。蒋承勇指出“一部文学史，是人的母题的演变史，亦是映照西方社会价值观念演变的一面镜子”（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150），他明确把文学批评视为观念史对话的一部分：以人性观念为索引，将各时期文学思潮所折射出的时代理念、哲学思想与美学观念纳入同一阐释语境。

在这一研究思路下，蒋承勇着重梳理的是不同文学思潮中所体现的人文内涵演变的内在关联。例如关于文艺复兴文学与18世纪启蒙文学的关系，他并非拘泥于具体的文本细节，而落脚于“人的观念”的关系。他认为文艺复兴初步实现了人文内涵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启蒙运动推进了这种转型。但由于文艺复兴的人文内涵呈现出前后分期与南北欧洲的差异，所以需要从观念史的角度梳理启蒙主义是在哪个层面推进了文艺复兴的思考。通过详细的文本分析，他明确指出启蒙主义所倡导的“人”，主要延续了文艺复兴人文概念的人智部分，而非原欲部分，从而强调理性。启蒙文学兼具古希腊-罗马的人本传统与近代科学理性，且通过道德化的世俗转译，使希伯来-基督教的人文伦理进入现代公共语汇。由此，18世纪的人道主义即两希传统的现代综合：推崇自我与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强调道德律令对自我的约束。但由于启蒙主义过于强调理性在人文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浪漫主义就展现出对启蒙理性单向扩张的纠偏，成为西方文明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文化与文明的反思与背离，因此文学中的自然不再只是对象性的他者，而成为反思文明、重塑主体的依据，蒋承勇正是从观念史的角度进行思考，从而确立浪漫主义思潮中自然、自我、自由在该世纪思想史的地位。¹在这一思路下，他将外国文学研究从作家-作品，转化为与思想史、观念史持续互动的解释工程，文学的演变不再机械、简单地附着于外部现实，而是成为思想史观念史演化的组成部分，文学研究获得更开阔的视野。

从观念史与文学史的互动视角切入文学批评，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避免只见文本不见结构的局限，避免单线式或标签化的解读。以《堂吉诃德》为例，若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简单理解为对古典原欲/个人主义的复归，便难以解释堂吉诃德为何被视作人文主义式的人物，却几乎不具备前期人文主义文本中那种对自然生命欲望与个体张力的外显形态。而在人文主义观念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就可以看到人文主义并非外在于基督教的对立物，而是在其内部生成，并与其维持着复杂关联，所以多数人文主义者面对世俗乱象往往会把目光转向基督教伦理资源。在此框架下，堂吉诃德就可被理解为西班牙人文主义的独特呈现：其忧患意识与博爱取向，体现了早期

1 参见蒋承勇：“论19世纪欧洲文学中的‘人’的形象”，《浙江社会科学》9（1997）：47-51。

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在伊比利亚语境中与宗教传统的对话与重组。这就为理解人物的矛盾性与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思想提供了突破口。再如，他在“浮士德与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一文中，拒绝把浮士德的张力归因为叙事情节，而将之视为近代欧洲思想史中人性-神性矛盾的象征表述，并借助斯宾诺莎与康德的概念资源，揭示文本如何在自我扩张与理性自律之间建立一种张力均衡，折射出近代欧洲人的文化价值核心。¹因此，他的研究实现了文学文本、文学批评与观念史的对话。

蒋承勇将文学批评纳入观念史的维度，精准把握并揭示了西方人文内涵发展中的关键性不足。他指出虽然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的异质与互补，但自文艺复兴之后，重心是在一直走着与中世纪传统文明相对抗的道路；宗教人本传统尽管一直伴随着现代文明，但与强劲的物欲推动力相比，显得势单力薄。这两种力量“对比的极度悬殊，是迄今为止乃至未来的西方社会越来越物欲化和功利化的深层文化原因，也是现代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之危机的文化根源”（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161）。这一思考不仅切入了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对于梳理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观也具有重要意义。五四时期我们借鉴引入了西方的人文传统，但人文主义这一观念在迁移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选择性，五四文学主要崇尚的是原欲+人智的人的观念，肯定自然本性、个人主义、世俗人本意识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之一，相对而言缺少“对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深度关怀”。我们需要重新检视这一向西方学习的过程，那么全面掌握西方人的观念史，深入批判其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对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建设有现实意义”（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161）。

总之，蒋承勇以两希文化为依据进行的人学研究，把文学置于观念演变之中，强调文学一方面有自身独立发生与发展的特点，但又与哲学、宗教、科技等知识谱系持续对话，从而参与了思想观念的生成，“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西方社会中人的精神发展史”（1），他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书写了一部西方人文观念的思想发展史。

四、文学人类学与方法论建构

蒋承勇以文学即人学为理论前提，对西方文学的人学研究，形成了一套自觉成型的方法论，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他将自己的文学研究方法明确称之为“文学人类学”。这一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源于对“人”的界定。

首先他区分了学术界常见的几种关于人的表述，指出人不是单纯的生物性个体，而是能够创造并运用文化、据以组织自然与社会的文化的动物，“文

1 参见 蒋承勇：“浮士德与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外国文学评论》2（2007）：115-123。

化就是人自身的对象化与外化”（47），“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使自己成为自然、社会与自身命运的主人”（48），因此需要从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多重关系入手，把文学纳入文化系统之内进行考察。纵观其研究，笔者尝试对其方法论提炼出几项重要的且具有借鉴性的要点。其一，研究对象。其研究对象落脚于具体的作家作品，强调文学批评从文本细读入手，但又需要超越孤立的作家或美学风格，考察的是在历史链条上能持续追踪人学母题。其二，人文维度与文化结构。以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多重向度介入文本，并紧密结合具体时代、不同国族的文化内涵等给出解析，以此把握作家如何把与人学相关的文化资源转译为文学表达。其三，连续与变奏原则。文化因素虽处于历史性变动之中，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延续性。西方文学的人学研究，需要始终围绕两希文化的对立互补的动态关系来进行解析，发现其延续与变异性。其四，跨学科研究。文学批评需要与同时期的宗教、哲学、政治与科学知识进行跨学科互证。但并非要把文学研究让位给文化学，而是在两希文化的框架中，“以文化学的眼光、手段与方法研究文学”（6），因此，他的研究最终落脚点依然是文学，体现出极强的文本解读功力，而文化学的视野有助于他实现对西方文学的深度把握。

在具体文本个案研究中，蒋承勇的这一文学人类学的方法，呈现出以个案细读为点，以观念史—文学史的框架为面的有效策略。以他对《堂吉诃德》的解读为例，他别具慧眼从作品内在的多重讽刺视角分析了文本中叙事视角的切换、情节的反讽等，区分了“虚拟的讽刺视角”“现实的讽刺视角”与“讽刺的讽刺”。在这种双重讽刺中，堂吉诃德由可笑的对象转化为具有宗教人本主义色彩的崇高人物，从而承载了塞万提斯的“新的人文主义理想”（139）。与此相应，桑丘并非功能性配角，他在讽刺功能、喜剧效应与人文表征上具有不可或缺性。他以现实主义话语对堂吉诃德的乌托邦理想加以消解，但在情感层面对骑士理想保持认同，构成一种讽刺视角的双向性。蒋承勇对文本的这一叙事特点的把握是极为精准的，但是他并非仅仅进行叙事艺术的剖析，而是将之放置于文艺复兴的历史场景中加以理解，使叙事艺术与人学主题结合。他结合西班牙天主教传统与宗教政治语境解释了堂吉诃德人文思想中的基督教底色，并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堂吉诃德与桑丘的合二为一才是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思想。小说的双重讽刺技法正体现了塞万提斯人文思想的双重性，从而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这种个案与文学史互证，文学技法与思想史融合的批评方法，正体现了其操作策略。

最后还需强调的是，蒋承勇关于西方文学人学的研究，也是对20世纪以来若干批评弊端的一种回应与矫正。面对术语泛滥、概念图解化等倾向，他始终以扎实的历史意识为基础，坚持以文本为中心，在写作中有意回避新潮术语的堆砌，以清晰、可读而不失深度的语言，重申文学批评应当兼顾人文关怀与表达艺术。这种自觉的学术风格，亦可作为其人学研究的内在贡献。而

依据本文前述可以看出，蒋承勇长期围绕西方文学的人学问题展开思考，对两希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解析，建构出“文学是人学”阐释的新框架，体现了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者在“人学”问题上的思考深度。一方面为理解西方文学的基本旨趣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另一方面也在本土语境中开拓了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视角与问题意识，并为后续开展跨学科对话与跨文化比较奠定了方法上的基础，展示了中国学者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的独特立场。

Works Cited

- 陈晓明：“在历史的关节点上——重读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文艺争鸣》11（2017）：28-32。
 [Chen Xiaoming. “At 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Rereading Qian Gurong’s ‘On Literature as the Study of Man’.” *Contention in Literature and Art* 11 (2017): 28-32.]
- 蒋承勇：“浮士德与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外国文学评论》2（2007）：115-123。
 [Jiang Chengyong. “Faust and the Essential Cultural Values of the European ‘Modern Individual’.”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2 (2007): 115-123.]
- ：“论19世纪欧洲文学中的‘人’的形象”，《浙江社会科学》9（1997）：47-51。
 [—.“On the Image of ‘Ma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Literature.”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9 (1997): 47-51.]
- ：“‘人’的母题与西方现代价值观——人文主义文学新论”，《文艺研究》12（2005）：23-29。
 [—.“The Motif of ‘Man’ and Modern Values in the West: A New perspective to Humanist Literature.” *Literary Studies* 12 (2005): 23-29.]
- ：《人性探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Exploring Human Nature*.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4.]
-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6（2004）：150-161。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tif of ‘Man’ in Western Literature and Its Impact over the New Literature during the May-Fourth Movemen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6 (2004): 150-161.]
-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The Motif of “Man” in Western Literature*.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8.]
-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Karl, Marx. “Capital.”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2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 朱立元：“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阐释——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探索与争鸣》9（2008）：4-10。
 [Zhu Liyuan. “From the New Era to the New Century: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Literature Is the Study of Man,’ with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f the Anthropolog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9 (2008): 4-10.]